



# 地区幸福感 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

沈维涛, 李杜康琦

厦门大学 管理学院, 厦门 361005

**摘要:** 作为对理性假设的修正, 税收的社会心理模型认为纳税人的纳税决策不仅是传统意义上外部环境约束之下的效用最大化, 同时也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在此思路下, 已有研究很少关注的地区心理因素——地区幸福感可能影响当地企业的税收遵从。

理论上, 幸福感是心理资本的一个维度, 地区幸福感属于区域内社会成员共享的心理资本, 因而能对企业纳税决策产生影响。地区幸福感与企业税收遵从的关系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 地区幸福感伴随的亲社会倾向会提高企业税收遵从水平; 另一方面, 地区幸福感也可能增加企业对避税潜在风险的容忍度, 使企业更可能从事避税, 此时企业税收遵从水平会降低。为此提出竞争性假说并进行实证检验, 以2007年至2018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来源, 运用描述性统计、相关性检验、多元回归分析等计量方法, 采用工具变量法和替代变量等稳健性检验手段, 分析地区幸福感是否会促进企业税收遵从, 并探究地区幸福感对企业税收遵从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异质性因素和经济后果。

研究表明, 企业所在城市的幸福感对企业税收遵从有显著影响, 地区幸福感越高, 企业税收遵从水平越高, 这一结果在处理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保持不变。机制检验发现, 地区幸福感能够抑制融资约束对企业税收遵从的消极影响并强化内部控制对避税的约束作用, 从而提高企业税收遵从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 地区幸福感的税收遵从效应在受社会监督程度低、管理层风险偏好高和董事会监督薄弱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此外, 使用基于新浪微薄的社交媒体语料情感分析方法测量地区幸福感后发现, 地区幸福感对企业税收遵从依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 地区幸福感通过促进企业税收遵从提升了企业价值。

从地区幸福感出发考察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因素, 为研究企业纳税决策影响因素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 也为充分发挥幸福感的价值提供了政策参考。地区幸福感的税收遵从效应表明, 中国以人民幸福为宗旨的发展转型不仅具有社会意义, 还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关键词:** 幸福感; 社会心理; 企业税收遵从; 心理资本; 融资约束; 内部控制

**中图分类号:** F275.1; C912.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672-0334.2023.02.007

**文章编号:** 1672-0334(2023)02-0100-16

## 引言

税收是国家筹集财政收入和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 由于企业是最主要的纳税者<sup>[1]</sup>, 理解企业税收遵从的决定因素十分重要。影响企业税收遵从的因素可能是企业内部的, 包括融资约束<sup>[2]</sup>、股权结构<sup>[3]</sup>、董事会独立性<sup>[4]</sup>等, 也可能是税收执法水平<sup>[5]</sup>、税收征

管强度<sup>[6]</sup>、金融发展<sup>[7]</sup>等外部因素。截至目前, 有关企业纳税决策外部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从社会心理角度探究企业税收遵从的决定因素。事实上, 企业税收遵从可能受到重要的社会群体心理特征——地区幸福感的影响。在中华文明的大背景下, 中国不同地区间存在比较明显的社会发展模式差异和区

**收稿日期:** 2020-03-11 **修返日期:** 2022-04-12

**作者简介:** 沈维涛, 经济学博士,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资本市场和公司财务等, 代表性学术成果为“风险投资会影响企业做市转让行为吗? ——我国新三板市场的实证研究”, 发表在2016年第10期《经济管理》, E-mail: [wtshe@xmu.edu.cn](mailto:wtshe@xmu.edu.cn)

李杜康琦,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等, E-mail: [lidukangqi@126.com](mailto:lidukangqi@126.com)

域文化差异<sup>[8]</sup>,各区域、各城市间形成了不同的幸福感水平<sup>[9]</sup>。幸福感作为一种心理资本<sup>[10]</sup>,对人们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sup>[11]</sup>。从地区心理资本角度看,地区幸福感可以被理解为通过社会成员之间交流互动形成的地区心理资本,具有指引地区社会成员行为的功能<sup>[12]</sup>,因而能对企业的纳税决策产生影响。

幸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吸引着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文化学等多个学科进行诠释。提高人民幸福感是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人民幸福”被列入中国梦的本质内涵。近年来,党中央围绕人民福祉推进了一系列体制和制度改革,本研究从企业税收遵从视角研究幸福感的微观效应,为中国以人民福祉为宗旨谋划改革发展提供证据支持。

## 1 相关研究评述

### 1.1 幸福感心理资本

幸福感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综合心理指标,属于心理资本的一个维度<sup>[10]</sup>。心理资本是可经后天开发的积极的心理发展状态,最初的心理资本概念包括希望、效能、适应力和乐观(hope, efficacy, resilience, and optimism, HERO)。随着研究的深入,如正念、勇气、感恩、幸福感等其他相关的心理资源也被纳入心理资本概念中<sup>[13]</sup>。心理资本在区域层面表现为地区心理资本<sup>[14]</sup>,指一个地区的人们共同具有的积极信念和心理认知<sup>[12]</sup>,幸福感属于心理资本的概念范畴,因而地区层面的幸福感可以被视为一项地区心理资本,能反映当地人们共性的积极心理状态。

有关幸福感对个人行为影响的研究发现,积极情绪会带来积极的思维方式并促进认知能力的提高<sup>[15]</sup>。幸福感能开拓人们看待问题的视角<sup>[16]</sup>并促进前瞻性思维<sup>[17]</sup>。与处于消极或中性情绪状态的个人相比,积极情绪体验会使个人更积极地感知他人和社会事件,从而更积极地评价自己和他人<sup>[18]</sup>。幸福感更高的人对他人处境有更强的感同身受的能力<sup>[19]</sup>,他们通常与人为善<sup>[20]</sup>并表现出更强的利他主义精神<sup>[21]</sup>。主观幸福感被证明与乐于合作<sup>[22]</sup>、富同理心<sup>[19]</sup>、慷慨<sup>[23]</sup>的性格特质密切相联。此外,感到幸福的人通常都更有生产力<sup>[18]</sup>,处于积极情绪状态的个体也更具大局观<sup>[18]</sup>,思维更具创造性和灵活性<sup>[19]</sup>。国家层面的幸福感水平能够促进人均GDP的提高<sup>[24]</sup>,主观幸福感水平也可以预测地区器官捐献率<sup>[21]</sup>和地区慈善捐款水平<sup>[25]</sup>。

与个人一样,企业经济活动离不开其所依赖的社会系统,企业因嵌入在社会环境之中往往会呈现出与所在地的社会群体心理状态相一致的组织文化<sup>[26]</sup>,地区幸福感作为地区成员共享的心理资本也具有指导地区成员行为的功能<sup>[12]</sup>。修宗峰等<sup>[27]</sup>对地区幸福感在微观企业层面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发现整体上地区幸福感降低了企业代理成本,而由于民营企业代理人利用职务获取非物质财富的便利性较低,地区幸福感提高了民营企业的代理成本。

进一步地,修宗峰等<sup>[28]</sup>将地区幸福感与企业社会责任联系起来,基于地区幸福感与信任、规范和网络等社会资本变量的密切关联,论证地区幸福感通过互惠规范和利他动机对企业捐赠发挥的积极作用。从公民义务的角度,纳税是企业无偿支付相应税款以支持政府提供社会服务的活动<sup>[29]</sup>,高度的税收遵从是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sup>[30]</sup>。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心理因素,地区幸福感对企业社会责任导向决策的影响力得到了已有研究的证明,然而关于地区幸福感与企业税收遵从的关系,已有研究尚未进行系统分析。鉴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围绕地区幸福感与企业税收遵从的关系展开研究,将企业税收遵从纳入到地区幸福感微观经济效应的分析。

### 1.2 纳税决策的社会心理模型

传统上,纳税决策影响因素的研究对象是个人,影响个人税收遵从的因素可以分为经济威慑变量和心理变量<sup>[31]</sup>。纳税决策的理性预期模型假设纳税主体是现实的经济人,纳税人通过评估成本与收益来决定是否避税<sup>[32]</sup>,并根据逃税被发现的概率和受惩罚的经济后果来决定纳税申报数额。税收遵从是纳税人按照税收法律法规和相关税收政策要求履行纳税义务的行为<sup>[33]</sup>。理性预期模型认为,通过加强监督和提高罚款对纳税人施加经济威慑是促进税收遵从的关键<sup>[34]</sup>。理性预期模型长期以来在关于纳税人税收遵从的研究中占有突出地位,然而,此模型越来越受到现实的考验。根据理性预期模型,理性的纳税人不会错过以低成本减少纳税的机会,但现实中却存在无监管的情况下从未偷税漏税的纳税人<sup>[35]</sup>,这说明纳税行为不应仅从经济角度来解释。与现实生活中的很多决策相同,纳税决策是包含大量个人心理动机的决定<sup>[36]</sup>,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能够影响纳税人的信念和态度并最终决定其税收遵从水平<sup>[37]</sup>。为了更深入地理解税收遵从行为,税收的社会心理模型从非经济因素出发刻画纳税决策过程,以弥补经典的理性预期模型的不足。一些研究确定了个体税收遵从的社会心理决定因素,包括公民责任感<sup>[38]</sup>、内化的社会规范<sup>[39]</sup>和社会价值取向<sup>[36]</sup>等。

广义的税收遵从包括个人税收遵从和企业税收遵从,企业税收遵从是指企业按照税收制度和税收管理要求履行纳税义务,企业税收遵从水平是指企业依法依规履行纳税义务的程度。理性预期模型认为个人层面的税收遵从取决于税率和因逃税受到惩罚的概率,这些税收遵从的决定因素也适用于由人组成的企业<sup>[35]</sup>。税收是企业的主要支出之一,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鼓励企业减少纳税数额,企业通常会权衡避税的边际收益与成本以确定其税收遵从水平,决定企业税收遵从水平的经济威慑因素有税收执法<sup>[5]</sup>和税收征管强度<sup>[6]</sup>等。在理性预期观点下,基于代理理论的企业纳税决策分析表明,与企业税收遵从相关的因素涉及董事会独立性<sup>[4]</sup>、所有权结构<sup>[3]</sup>和内部控制<sup>[2]</sup>等企业内部治理特征,以及政策不确定性<sup>[6]</sup>和产业集聚<sup>[40]</sup>等外部环境要素。目前,学者

们对决定企业税收遵从的正式治理机制给予了较多的关注<sup>[41]</sup>,大多数研究将企业视为“经济性”组织,而忽视了企业因嵌入社会结构中而产生的社会属性。企业会在文化上适应其所处的社会环境<sup>[42]</sup>,从而呈现出与所在地的社会群体心理状态相一致的态度和行为<sup>[26]</sup>。基于企业的社会属性,企业纳税决策也将受到地区心理特征的影响。随着纳税决策的社会心理模型引入被忽视的非经济因素来解释税收遵从,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在提高企业税收遵从方面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地区宗教信仰<sup>[41]</sup>、社会信任<sup>[43]</sup>和公民规范<sup>[44]</sup>被发现是企业税收遵从的重要驱动因素。

综上,税收遵从的研究正在从只关注经济因素转向对更广泛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的考察。本研究延续这一研究趋势,将幸福感纳入纳税决策社会心理决定因素的框架中解释企业税收遵从。

## 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2.1 地区幸福感促进企业税收遵从:亲社会假设

企业缴纳的税款可以用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有助于促进社会目标的实现<sup>[29]</sup>。积极纳税是企业对社会负责的重要体现<sup>[30]</sup>。D'ATTOMA et al.<sup>[36]</sup>认为,高水平的税收遵从不仅是对风险与收益进行计算的结果,其本身还是一种以追求社会利益为动机的亲社会决策。幸福感对亲社会行为发挥促进作用<sup>[23]</sup>,作为个人内在积极能量的体现,幸福感能增加同理心和对他人利益的广泛关注<sup>[19]</sup>,激发高度的利他主义精神<sup>[21]</sup>。幸福感高的人 would 花较多的时间在工作场所和正式场景之外帮助他人<sup>[45]</sup>、愿意参加志愿活动<sup>[22]</sup>和为慈善机构捐款<sup>[23]</sup>。特别地,在处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时,幸福感能促进追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并与对公共产品的高度合作意识相关<sup>[46]</sup>。FER-RER-I-CARBONELL et al.<sup>[47]</sup>调查发现,幸福感高的人逃税概率更低。

幸福感强化利他主义偏好和为公共利益做贡献的意愿,有助于构建一个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社会<sup>[48]</sup>。地区层面的幸福感作为一项地区心理资本,能反映出当地共性的积极心理状态<sup>[12]</sup>。当企业处于高幸福感水平的地区内,在决策过程中就会更多地考虑社会公众的利益,从而更有可能表现出亲社会行为,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sup>[28]</sup>。因此,地区幸福感能促进企业行为以利他和追求社会利益为动机,进而促进企业的税收遵从。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

H<sub>1a</sub> 地区幸福感促进企业税收遵从,即企业所在地幸福感水平越高,企业税收遵从水平越高。

### 2.2 地区幸福感抑制企业税收遵从:风险容忍假设

企业减少纳税会产生更多的现金流,可用来促进企业投资、履行债务,或以股息或股票回购的形式分配给股东,企业以股东为中心的观点认为从事避税符合股东的利益<sup>[49]</sup>。同时,激进的避税活动也是高风险的活动,避税程度的提高导致更大的被税务机关处罚的风险,带来声誉损失和诉讼成本<sup>[50]</sup>。避税活动还伴随着企业透明度的降低,增加了未来现金

流的不确定性和企业股价急剧下跌的长期风险<sup>[51]</sup>。由于企业避税的后果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对风险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避税意愿,研究发现更高的风险承担水平是企业避税的重要原因<sup>[52]</sup>。幸福感是超越人力、社会和物质资本形式的心理资本,能作为潜在的精神资源鼓舞人们改变现状和突破不确定。稳定的快乐情绪能降低风险感知<sup>[53]</sup>,处于积极情感状态的人更容易检索到与情绪一致的记忆,因而对积极事件的预期概率更高,对消极事件的预期概率更低<sup>[54]</sup>。在进行风险性决策的情景下,积极的心理状态有助于对所处环境和成功概率做出积极的评价,从而高幸福感的个体会表现出更强的冒险倾向<sup>[55]</sup>。地区幸福感反映了地区内的共有心理资本水平,当地区幸福感较高时,企业对避税活动未来收益的判断较为乐观,对避税相关风险的接受度较高。因此,幸福感可通过作用于企业对风险的态度降低企业税收遵从水平。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

H<sub>1b</sub> 地区幸福感促进企业税收规避,即企业所在地幸福感水平越高,企业税收遵从水平越低。

## 3 研究设计

### 3.1 样本和数据

本研究以2007年至2018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来源,进行如下处理:①剔除金融行业样本;②剔除ST类和PT类企业;③参考吴联生<sup>[56]</sup>和陈德球等<sup>[6]</sup>的研究,剔除税前会计利润小于等于0、实际税率小于0或大于1的样本;④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涵盖3533家企业的共20954个观测值。幸福感数据来自中国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和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工作委员会提供的2007年至2018年“十大幸福感城市排行榜”,企业所在地信息和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内部控制数据来自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数据库,省份统计数据来自万德数据库,媒体关注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数据库。为去除极端值影响,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

### 3.2 变量定义

#### 3.2.1 企业税收遵从

本研究参考刘行等<sup>[7]</sup>和张座铭等<sup>[57]</sup>的研究,基于企业现金所得税率计算企业税收遵从指标。由于中国对不同行业的上市企业实行差别的所得税政策,各企业的法定税率不尽相同。各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率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其实际纳税水平,所以本研究以企业法定所得税率与企业实际所得税率之差测量企业税收遵从( $Dtr$ ),企业实际所得税率等于所得税费用与递延所得税费用之差除以税前会计利润。 $Dtr$ 的值越低,企业税收遵从水平越高。考虑到税收优惠和税务纠纷的持续性,另外采用 $Dtr$ 的5年( $t-4$ 年~ $t$ 年)平均值测量企业税收遵从水平,该值越小,企业税收遵从水平越高。

#### 3.2.2 地区幸福感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由新华社

《瞭望东方周刊》和瞭望智库共同主办,是具有较高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城市调查推选活动。由于问卷调查受到受访者情绪状态影响,单一年份的幸福感排名不能准确测量地区幸福感,因此借鉴修宗峰等<sup>[28]</sup>的做法,根据地理距离构建地区幸福感变量。本研究的地区幸福感变量围绕2007年至2018年“十大幸福感城市排行榜”中上榜次数最多的杭州、成都、长沙、南京4个城市构建。刘斌等<sup>[58]</sup>发现幸福感具有传染效应,幸福感的溢出效应随着区域间地理距离的邻近而加强。距离较近的地区之间交往更密切,呈现出相近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更容易形成相似的幸福水平。本研究使用Google地图等互联网方式,收集企业注册地所在城市和四大幸福感城市的经纬度,计算出企业所在城市与杭州、成都、长沙、南京的地理距离,将4个距离值中的最小值加1后取自然对数再取相反数作为地区幸福感变量,该值越大,地区幸福感越高。同时,引入哑变量 $HP$ ,当企业位于杭州、成都、长沙或南京时, $HP$ 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 3.2.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的选择考虑了影响企业纳税水平的关键因素。①控制企业特征变量: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可能有更高的避税成本<sup>[59]</sup>或更多的税务筹划机会<sup>[60]</sup>;资产负债率,负债的利息具有税盾作用,较高的负债率可以降低企业纳税水平<sup>[61]</sup>;资产收益率,盈利能力强的企业更可能参与企业避税以减少其税收负担<sup>[62]</sup>;营业收入增长率,用来控制企业成长性,高成长性的企业受到负面冲击时陷入经营困境的可能性更大,此时,企业通过避税来化解经营风险的需求增加<sup>[63]</sup>;账面市值比,控制增长机会,增长前景较好的企业有更多的机会进行税务筹划<sup>[64]</sup>;企业年龄,成长期企业更有动机选择较为激进的税收行为<sup>[65]</sup>;产权性质,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从事避税的经济动机较弱<sup>[66]</sup>;存货密集度和资本密集度,较低的存货水平和较高的资本密集度有利于企业利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来降低纳税水平<sup>[66]</sup>;投资收益,投资收益的税前扣除可以降低企业应税所得额<sup>[67]</sup>;是否亏损,以前年度的亏损可以在以后年度税前扣除<sup>[68]</sup>。②在企业内部治理特征方面,研究发现股权结构<sup>[3]</sup>、董事会独立性<sup>[4]</sup>、管理层股权激励<sup>[49]</sup>、外部审计<sup>[69]</sup>是企业税收遵从水平的影响因素,故模型中加入了第一大股东所有权、CEO与董事长是否两职兼任、管理层持股比、年报是否由四大审计作为控制变量。此外,陈德球等<sup>[6]</sup>的研究表明税收征管强度会显著影响企业纳税水平,故对各地区的税收征管强度进行控制。参照陈德球等<sup>[6]</sup>采用的计算方法,税收征管强度等

于  $\frac{\text{年税收收入}}{\text{GDP}}$ , 将企业所在省的  $\frac{\text{年第一产业产值}}{\text{GDP}}$ 、 $\text{Pre}(\frac{\text{年税收收入}}{\text{GDP}})$ 、 $\frac{\text{年第二产业产值}}{\text{GDP}}$ 、 $\frac{\text{年进出口贸易总额}}{\text{GDP}}$  对  $\frac{\text{年税收收入}}{\text{GDP}}$  进

行回归,根据拟合的回归方程计算预期的税收征管强度,即  $\text{Pre}(\frac{\text{年税收收入}}{\text{GDP}})$ 。表1给出各变量的定义。

### 3.3 模型设定

为探究地区幸福感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构建实证模型,即

$$\begin{aligned} Dtr_{i,t}/Ldr_{i,t} = & \alpha_0 + \alpha_1 Hap_{i,t}(HP_{i,t}) + \alpha_2 Siz_{i,t} + \alpha_3 Lev_{i,t} + \\ & \alpha_4 Roa_{i,t} + \alpha_5 Grw_{i,t} + \alpha_6 BM_{i,t} + \alpha_7 Fag_{i,t} + \\ & \alpha_8 Soe_{i,t} + \alpha_9 Inv_{i,t} + \alpha_{10} Ppe_{i,t} + \alpha_{11} Ret_{i,t} + \\ & \alpha_{12} Los_{i,t} + \alpha_{13} Top_{i,t} + \alpha_{14} Dua_{i,t} + \\ & \alpha_{15} Msh_{i,t} + \alpha_{16} Bg4_{i,t} + \alpha_{17} TE_{i,t} + \\ & \sum Yea_{i,t} + \sum Ind_{i,t}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quad (1)$$

其中, $i$ 为企业, $t$ 为年, $\alpha_0$ 为截距项, $\alpha_1 \sim \alpha_{17}$ 为回归系数, $\varepsilon_{i,t}$ 为误差项。本研究关注 $\alpha_1$ ,若 $\alpha_1$ 显著为负,支持 $H_{1a}$ ,即地区幸福感对企业税收遵从发挥正向作用;若 $\alpha_1$ 显著为正,支持 $H_{1b}$ ,即地区幸福感对企业税收遵从发挥负向作用。

## 4 实证分析

### 4.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

表2给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 $Dtr$ 和 $Ldr$ 均值分别为-0.001和0.018,标准差分别为0.136和0.087,中位数分别为0.006和0.018,说明大部分样本企业的实际税率低于法定税率, $Dtr$ 的分布呈左偏。 $Hap$ 均值为-5.425,最大值为0,最小值为-7.635,标准差为1.903,说明不同企业之间所在地幸福感存在较大差异。在控制变量中, $TE$ 的均值为0.941,中位数为0.927,说明大部分样本企业所在省的实际税收收入低于预期的税收收入。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均在正常范围内。

表3给出变量的Pearson相关关系检验结果。 $Hap$ 与 $Dtr$ 的相关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表明地区幸福感与企业税收遵从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再确定。同时,大部分的控制变量与企业税收遵从在1%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有必要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以排除这些变量的影响。对自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进行的共线性检验结果表明,VIF的最大值为2.130,表明共线性不严重。

### 4.2 回归分析

表4给出对(1)式的估计结果。在表4的第2列和第4列中, $Hap_{i,t}$ 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在第3列和第5列中, $HP_{i,t}$ 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企业所在地的地区幸福感与企业税收遵从正相关,证明地区幸福感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符合亲社会假说,而非风险容忍假说,地区幸福感具有显著的税收遵从效应。 $H_{1a}$ 得到验证。

表4的第2列中 $Hap_{i,t}$ 的回归结果表明,如果地区幸福感从数据中的25%分位数增加到75%分位数,即从-6.501增加到-5.060,税率差异将降低约0.144% $(-0.001 \times (6.501 - 5.060))$ ,相当于样本企业税率差异均值绝对值的1.441倍。样本企业税前收入的平均值

表 1 变量定义  
Table 1 Definitions of Variables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因变量	企业税收遵从	$Dtr$	法定所得税率 - $\frac{\text{所得税费用} - \text{递延所得税费用}}{\text{税前会计利润}}$ , 值越小, 税收遵从水平越高
		$Ldr$	( $t-4$ )年~ $t$ 年 $Dtr$ 的平均值, 值越小, 税收遵从水平越高
自变量	地区幸福感	$Hap$	注册城市与杭州、成都、长沙、南京的地理距离中的最小值加1后取自然对数, 再取相反数, 值越大, 地区幸福感越高
		$HP$	当注册城市为杭州、成都、长沙和南京其中之一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	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Lev$	$\frac{\text{总负债}}{\text{总资产}}$
	资产收益率	$Roa$	$\frac{\text{净利润}}{\text{总资产}}$
	营业收入增长率	$Grw$	$\frac{\text{本年营业收入} - \text{上年营业收入}}{\text{本年营业收入}}$
	账面市值比	$BM$	$\frac{\text{总资产}}{\text{年末股票总市值}}$
	企业年龄	$Fag$	存续年数的自然对数
	产权性质	$Soe$	当企业的最终控制人为国有时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存货密集度	$Inv$	$\frac{\text{年末存货净值}}{\text{总资产}}$
	资本密集度	$Ppe$	$\frac{\text{年末固定资产净值}}{\text{总资产}}$
	投资收益	$Ret$	$\frac{\text{年末投资收益}}{\text{总资产}}$
	是否亏损	$Los$	上一年度的净利润小于 0 时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第一大股东所有权	$Top$	第一大股东拥有上市企业的所有权比例
	两职兼任	$Dua$	当董事长与总经理为同一人时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管理层持股比	$Msh$	董事、监事和高管持股比例
	是否四大审计	$Bg4$	当上市企业的审计师来自国际四大时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
	省税收征管强度	$TE$	计算方法见 3.2.3
	年度	$Yea$	年度虚拟变量
	行业	$Ind$	行业虚拟变量, 按照证监会 2012 年行业分类标准, 非制造业按一级行业分类, 制造业按细分行业分类

为 7.541 亿元人民币, 假定同一企业法定所得税率保持不变, 平均而言每年每家企业纳税额将增长 0.011 亿元人民币 ( $7.541 \times 0.144\%$ )。这些结果隐含的经济影响是, 样本有 3 533 家企业, 相应地, 对年度企业纳税水平的总体影响约为 38.863 亿元人民币 ( $0.011 \times 3 533$ )。中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 2007 年至 2018 年企业所得税总额的年平均额约为 20 937.921 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 地区幸福感从 25% 分位数增加到

75% 分位数, 可以使样本企业总所得税纳税数额占国家企业所得税收入的比例每年增加约 0.186% ( $\frac{38.863}{20\ 937.921}$ )。

### 4.3 稳健性检验

#### 4.3.1 工具变量回归

本研究结果表明, 地区幸福感与企业税收遵从正相关。然而, 一个潜在的问题是, 模型估计仍然可能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le 2 Results for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	样本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25%分位数	中位数	75%分位数	最大值
<i>Dtr</i>	20 954	-0.001	0.136	-0.537	-0.046	0.006	0.079	0.250
<i>Ldr</i>	10 851	0.018	0.087	-0.235	-0.028	0.018	0.066	0.236
<i>Hap</i>	20 954	-5.425	1.903	-7.635	-6.501	-6.207	-5.060	0
<i>HP</i>	20 954	0.090	0.286	0	0	0	0	1
<i>Siz</i>	20 954	22.090	1.258	19.810	21.170	21.910	22.800	26.030
<i>Lev</i>	20 954	0.427	0.202	0.047	0.266	0.425	0.583	0.854
<i>Roa</i>	20 954	0.050	0.039	0.002	0.021	0.041	0.069	0.195
<i>Grw</i>	20 954	0.225	0.454	-0.467	0.013	0.138	0.308	3.073
<i>BM</i>	20 954	0.608	0.236	0.129	0.425	0.607	0.789	1.106
<i>Fag</i>	20 954	2.674	0.412	1.099	2.485	2.708	2.944	3.401
<i>Soe</i>	20 954	0.412	0.492	0	0	0	1	1
<i>Inv</i>	20 954	0.158	0.148	0	0.062	0.119	0.199	0.731
<i>Ppe</i>	20 954	0.221	0.166	0.002	0.093	0.186	0.314	0.714
<i>Ret</i>	20 954	0.008	0.016	-0.006	0	0.002	0.008	0.099
<i>Los</i>	20 954	0.051	0.220	0	0	0	0	1
<i>Top</i>	20 954	0.355	0.150	0.090	0.235	0.337	0.457	0.751
<i>Dua</i>	20 954	0.244	0.429	0	0	0	0	1
<i>Msh</i>	20 954	0.121	0.196	0	0	0.001	0.194	0.698
<i>Bg4</i>	20 954	0.059	0.235	0	0	0	0	1
<i>TE</i>	20 954	0.941	0.174	0.611	0.803	0.927	1.027	1.367

受到与企业税收遵从和地区幸福感相关的遗漏变量的影响,同时影响这两个变量的地区因素会导致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为此,本研究选取城市气候宜人度和人均住房面积作为地区幸福感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天气要素作用于人体感官而对个体心理产生影响,适宜的气候对幸福感有重要的积极影响<sup>[70]</sup>。人体适宜的环境温度范围是19℃~25℃,在气温为22℃时,个体能达到最佳的情绪状态<sup>[71]</sup>,故本研究将城市年度平均气温与22℃之差的绝对值取相反数构建测量气候宜人度的变量,用*Clm*表示,该值越大,城市气候越宜人。本研究选取的第二个工具变量是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建筑表现人和社会,也影响着人的观念和行为。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赋予了住房对于居民幸福感独特的意义,中国是家本位的社会,住房是家的实体,住房直接关系着居民的幸福<sup>[72]</sup>。张翔等<sup>[73]</sup>发现,与房屋的资产属性相比,房屋的居住属性,即房屋房间数目和房屋人均使用面积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本研究选取城市

人均住房面积的自然对数作为幸福感的第二个工具变量,用*Spc*表示。城市人均住房面积数据来自《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分县资料》。目前没有理论或实证证据将城市气候和人均住房面积与企业税收遵从联系起来,预期工具变量满足排除限制。工具变量回归的第1阶段将*Hap<sub>it</sub>*对工具变量*Clm<sub>it</sub>*、*Spc<sub>it</sub>*和(1)式中的控制变量进行回归,估计出预测值*Iha<sub>it</sub>*,第2阶段将*Dtr<sub>it</sub>*和*Ldr<sub>it</sub>*对预测值*Iha<sub>it</sub>*和(1)式中的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见表5。表5的第2列和第4列给出第1阶段的回归结果,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C-DF统计量分别为3468.406和1722.775,高于STOCK et al.<sup>[74]</sup>给出的临界值,表明工具变量是相关的。表5的第3列和第5列给出第2阶段的回归结果,Sargan检验的*p*值分别为0.312和0.211,不能拒绝工具变量外生的原假设,说明本研究的工具变量是外生的。在表5的第3列和第5列中,*Iha<sub>it</sub>*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处理了潜在内生性问题后,前文结果

表 3 相关系数  
Table 3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变量	Dtr	Ldr	Hap	HP	Siz	Lev	Roa	Grw	BM	Fag	Soe	Inv	Ppe	Ret	Los	Top	Dua	Msh	Bg4
Ldr	0.651***	1																	
Hap	-0.002	-0.005	1																
HP	-0.008	-0.003	0.897***	1															
Siz	-0.094***	-0.119***	-0.067***	-0.030***	1														
Lev	-0.170***	-0.201***	-0.026***	0.001	0.527***	1													
Roa	0.289***	0.242***	0.039***	0.026***	-0.120***	-0.415***	1												
Grw	0.037***	0.037***	-0.015**	-0.004	0.041***	0.071***	0.121***	1											
BM	-0.160***	-0.117***	-0.027***	-0.023***	0.510***	0.367***	-0.327***	-0.025**	1										
Fag	-0.104***	-0.193***	-0.013*	-0.016*	0.200***	0.183***	-0.116***	-0.027***	0.031***	1									
Soe	-0.006	0.049***	-0.079***	-0.031***	0.337***	0.317***	-0.155***	-0.065***	0.194***	0.136***	1								
Inv	-0.138***	-0.202***	0.003	-0.001	0.129***	0.359***	-0.160***	0.037***	0.128***	0.078***	0.043***	1							
Ppe	0.069***	0.097***	-0.074***	-0.079***	0.099***	0.086***	-0.091***	-0.074***	0.113***	-0.004	0.225***	-0.334***	1						
Ret	0.129***	0.197***	0.010	0.004	0.041***	-0.024***	0.120***	-0.072***	-0.066***	0.142***	0.092***	-0.067***	-0.101***	1					
Los	-0.011	-0.056***	-0.018***	-0.009	-0.031***	0.099***	-0.164***	0.062***	-0.036***	0.052***	0.044***	-0.004	0.071***	0.096***	1				
Top	0.024***	0.012	-0.001	0.009	0.201***	0.076***	0.088***	0.004	0.167***	-0.124***	0.213***	0.052***	0.077***	-0.050***	-0.045***	1			
Dua	0.007	-0.016*	0.013*	-0.011	-0.179***	-0.175***	0.073***	0.016*	-0.096***	-0.077***	-0.300***	-0.041***	-0.107***	-0.058***	-0.033***	-0.051***	1		
Msh	0.024***	-0.036***	0.045***	0.027***	-0.346***	-0.363***	0.179***	0.041***	-0.094***	-0.249***	-0.503***	-0.116***	-0.187***	-0.145***	-0.082***	-0.112***	0.271***	1	
Bg4	0.012*	0.035***	-0.027***	-0.030***	0.366***	0.120***	0.022***	-0.021***	0.160***	0.014**	0.147***	-0.025***	0.071***	0.025***	-0.009	0.141***	-0.076***	-0.124***	1
TE	-0.041***	-0.055***	-0.003	-0.071***	0.079***	0.043***	-0.034***	-0.026***	-0.014*	0.057***	0.096***	0.007	-0.028***	0.035***	0.017**	0.048***	-0.042***	-0.063***	0.045***

注: \*\*\*为在1%水平上显著, \*\*为在5%水平上显著, \*为在10%水平上显著, 下同。

**表 4 地区幸福感与企业税收遵从的回归结果**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for Regional Happiness and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

变量	$Dtr_{i,t}$	$Dtr_{i,t}$	$Ldr_{i,t}$	$Ldr_{i,t}$
$Hap_{i,t}$	-0.001*** (-2.613)		-0.001*** (-3.041)	
$HP_{i,t}$		-0.010*** (-3.246)		-0.008*** (-3.247)
$Siz_{i,t}$	-0.002 (-1.539)	-0.002 (-1.482)	0.007*** (7.564)	0.007*** (7.630)
$Lev_{i,t}$	-0.031*** (-4.972)	-0.031*** (-4.930)	-0.071*** (-13.018)	-0.071*** (-12.982)
$Roa_{i,t}$	0.918*** (33.297)	0.918*** (33.294)	0.276*** (11.995)	0.275*** (11.987)
$Grw_{i,t}$	0.005** (2.442)	0.005** (2.443)	0.006*** (3.113)	0.006*** (3.108)
$BM_{i,t}$	-0.006 (-1.040)	-0.006 (-1.074)	-0.005 (-1.073)	-0.005 (-1.073)
$Fag_{i,t}$	0.0004 (0.158)	0.0004 (0.144)	-0.002 (-0.609)	-0.002 (-0.628)
$Soe_{i,t}$	0.002 (0.944)	0.002 (1.016)	0.003 (1.641)	0.003* (1.687)
$Inv_{i,t}$	-0.035*** (-4.047)	-0.035*** (-4.080)	-0.045*** (-6.632)	-0.046*** (-6.657)
$Ppe_{i,t}$	0.056*** (8.035)	0.055*** (7.956)	0.005 (0.839)	0.004 (0.796)
$Ret_{i,t}$	0.820*** (14.563)	0.818*** (14.539)	0.601*** (13.590)	0.600*** (13.557)
$Los_{i,t}$	0.005 (1.137)	0.005 (1.156)	-0.166*** (-5.701)	-0.166*** (-5.702)
$Top_{i,t}$	0.002 (0.392)	0.003 (0.415)	0.006 (1.085)	0.006 (1.122)
$Dua_{i,t}$	-0.001 (-0.462)	-0.001 (-0.505)	0.001 (0.588)	0.001 (0.562)
$Msh_{i,t}$	-0.011* (-1.941)	-0.011* (-1.913)	-0.003 (-0.453)	-0.003 (-0.442)
$Bg4_{i,t}$	0.007* (1.813)	0.007* (1.756)	0.005* (1.885)	0.005* (1.823)
$TE_{i,t}$	0.005 (0.957)	0.004 (0.683)	0.011** (2.486)	0.009** (2.169)
$Yea_{i,t}$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_{i,t}$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169*** (6.833)	0.177*** (7.168)	0.058*** (2.762)	0.065*** (3.118)
样本观测值	20 954	20 954	10 851	10 851
调整的 $R^2$	0.191	0.191	0.329	0.329

注: 括号内数据为  $t$  值, 下同。

**表 5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s for Instrumental Variables**

变量	第 1 阶段 $Hap_{i,t}$	第 2 阶段 $Dtr_{i,t}$	第 1 阶段 $Hap_{i,t}$	第 2 阶段 $Ldr_{i,t}$
$Iha_{i,t}$		-0.003*** (-2.648)		-0.003*** (-4.229)
$Clm_{i,t}$	0.081*** (21.084)		0.078*** (14.375)	
$Spc_{i,t}$	5.522*** (78.362)		5.553*** (54.84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_{i,t}$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_{i,t}$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5.522*** (78.362)	0.201*** (5.960)	-21.673*** (-30.479)	0.090*** (3.130)
样本观测值	11 102	11 102	5 753	5 753
调整的 $R^2$	0.431	0.197	0.426	0.341
C-D F 统计量	3 468.406		1 722.775	
Sargan 统计量	1.023( $p = 0.312$ )		1.563( $p = 0.211$ )	

注: 由于  $Spc_{i,t}$  和  $Clm_{i,t}$  的部分观测值缺失, 样本观测值有所减少。

仍然成立。

#### 4.3.2 更换企业税收遵从指标

本研究对实际所得税率的计算式进行变体, 即

$$\text{实际所得税率 1} = \frac{\text{所得税费用} - \text{递延所得税费用}}{\text{税前会计利润} - \frac{\text{递延所得税费用}}{\text{企业所得税税率}}}$$

$$\text{实际所得税率 2} = \frac{\text{所得税费用}}{\text{税前会计利润} - \frac{\text{递延所得税费用}}{\text{企业所得税税率}}}$$

$$\text{实际所得税率 3} = \frac{\text{所得税费用}}{\text{税前会计利润}}$$

采用实际所得税率的变体形式计算得到新的当期和长期实际税率差异后重新利用 (1) 式进行回归。另外, 直接用实际所得税率及其变体形式作为企业税收遵从的代理变量重新利用 (1) 式进行回归。未报告的结果表明, 本研究结果仍然成立。

#### 4.3.3 更换地区幸福感指标

根据企业所在地与上榜次数最多的六大幸福感城市、八大幸福感城市的地理距离重新测量地区幸福感, 重复前文对 (1) 式进行的回归。未报告的结果表明, 地区幸福感仍对企业税收遵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4.3.4 其他稳健性检验

2007年开始实行的新《企业会计准则》要求企业统一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企业所得税,为控制这一影响,截取2008年及以后年度的观测值重新进行回归;考虑地区间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差异以及IPO当年的企业财务状况波动较大,在控制变量中加入省社会信任水平、省市场化程度和是否为企业IPO当年重新进行回归;由于上市企业的注册地较少随时间变化,前文的回归模型为当期被解释变量对当期解释变量的回归,考虑到除地区幸福感之外的其他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存在反向因果的可能,将所有解释变量滞后1年重新进行回归。本研究还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删除注册地与办公地不一致的样本、对相关系数较高的Siz、Lev、BM进行中心化处理后重新进行回归。经上述处理,未报告的结果表明,本研究结果仍然成立。

4.4 影响机制探索

地区幸福感可以通过减弱避税的经济动机鼓励企业税收遵从。当财务约束较强时,企业会通过税务筹划创造内部现金流以缓解财务压力<sup>[2]</sup>。本研究预期当企业从事避税的经济动机较强时,地区幸福感作为一种非经济动机对企业税收遵从发挥的影响更显著。参考KAPLAN et al.<sup>[75]</sup>和陈作华等<sup>[2]</sup>的研究,本研究以KZ指数测量企业融资约束程度。按照以下步骤计算KZ指数:①按 $\frac{\text{经营性净现金流}}{\text{总资产}}$ 、 $\frac{\text{现金股利}}{\text{总资产}}$ 、

$\frac{\text{现金持有}}{\text{总资产}}$ 、 $\frac{\text{总负债}}{\text{总资产}}$ 和 $\frac{\text{股票总市值}+\text{总负债}}{\text{总资产}}$ 的值是否低于年度中位数对全样本进行分类,构建变量kz1、kz2、kz3、kz4、kz5,如果上述5个数值低于年度中位数,则kz1~kz5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②令 $KZ = kz1 + kz2 + kz3 + kz4 + kz5$ 。③采用排序逻辑回归,将KZ作为因变量对 $\frac{\text{经营性净现金流}}{\text{总资产}}$ 、 $\frac{\text{现金股利}}{\text{总资产}}$ 、 $\frac{\text{现金持有}}{\text{总资产}}$ 、 $\frac{\text{总负债}}{\text{总资产}}$ 和 $\frac{\text{股票总市值}+\text{总负债}}{\text{总资产}}$ 进行回归,估计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④用上述回归模型的回归系数计算拟合值,即为测量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的KZ指数,KZ指数越大,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表6给出影响机制的检验结果,在(1)式的基础上加入 $KZ_{i,t}$ 、 $Hap_{i,t} \cdot KZ_{i,t}$ 和 $HP_{i,t} \cdot KZ_{i,t}$ 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由表6的第2列和第3列可知, $Hap_{i,t} \cdot KZ_{i,t}$ 和 $HP_{i,t} \cdot KZ_{i,t}$ 的回归系数分别在5%和1%水平上显著为负,实证结果与预期一致,即地区幸福感的影响对于财务压力较大的企业更明显,说明地区幸福感通过抑制融资约束导致的避税动机促进了企业税收遵从。

社会心理和内部监控分别是促进企业税收遵从的非正式机制和正式机制。有效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能发现财务报表舞弊,并防止复杂、不透明的避税活动<sup>[2]</sup>。地区幸福感和内部控制可能存在两个方面相互作用,这表现为地区幸福感可能强化内部控制对企业避税的约束,也可能弥补内部控制对

表6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Table 6 Regression Results for the Mechanism Test

变量	$Dtr_{i,t}$	$Dtr_{i,t}$	变量	$Dtr_{i,t}$	$Dtr_{i,t}$
$KZ_{i,t}$	0.001 (0.404)	0.004*** (5.664)	$IC_{i,t}$	0.0005 (0.107)	0.011*** (7.359)
$Hap_{i,t}$	-0.001** (-2.065)		$Hap_{i,t}$	0.010** (2.077)	
$Hap_{i,t} \cdot KZ_{i,t}$	-0.001** (-2.223)		$Hap_{i,t} \cdot IC_{i,t}$	-0.002** (-2.325)	
$HP_{i,t}$		-0.010*** (-2.860)	$HP_{i,t}$		0.049 (1.556)
$HP_{i,t} \cdot KZ_{i,t}$		-0.005*** (-2.720)	$HP_{i,t} \cdot IC_{i,t}$		-0.009* (-1.86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Yea_{i,t}$	控制	控制	$Yea_{i,t}$	控制	控制
$Ind_{i,t}$	控制	控制	$Ind_{i,t}$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121*** (4.328)	0.129*** (4.615)	常数项	0.157*** (4.192)	0.099*** (3.689)
样本观测值	18 471	18 471	样本观测值	20 489	20 489
调整的 $R^2$	0.190	0.191	调整的 $R^2$	0.191	0.191

注:由于 $KZ_{i,t}$ 和 $IC_{i,t}$ 的部分观测值缺失,样本观测值有所减少。

企业避税的管控不足。为从内部控制视角进一步探索地区幸福感对企业税收遵从发挥作用的机制, 本研究选取内部控制作为调节变量进行回归。参考陈作华等<sup>[2]</sup>的研究, 使用来自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数据库的内部控制指数构建内部控制变量, 用内部控制指数加 1 后取自然对数测量企业内部控制质量, 用  $IC_{i,t}$  表示, 在 (1) 式中加入  $IC_{i,t}$ 、 $Hap_{i,t} \cdot IC_{i,t}$  和  $HP_{i,t} \cdot IC_{i,t}$  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由表 6 的第 5 列和第 6 列可知,  $Hap_{i,t} \cdot IC_{i,t}$  和  $HP_{i,t} \cdot IC_{i,t}$  的回归系数分别在 5% 和 10% 水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随着地区幸福感提高, 内部控制对企业税收遵从的正向影响加强, 当企业内部控制机制能有效监督企业经济活动时, 地区幸福感促进企业税收遵从的作用会更强。上述机制分析结果表明, 通过减弱融资约束对企业税收遵从的负面影响和增强内部控制的约束力, 地区幸福感发挥了税收遵从效应。

### 5 进一步分析

#### 5.1 社会监督的影响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企业税收遵从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企业受到的社会监督程度不同, 地区幸福感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也可能有差异。因此, 本研究进一步考虑不同社会监督水平下地区幸福感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媒体守望社会, 能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增加企业不负责任行为的声誉成本发挥治理功能, 显著抑制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sup>[76]</sup>。考虑到媒体具有信息中介和补充行政监管的双重功能, 能够对企业行为发挥重要的监督作用, 本研究使用媒体监督作为社会监督的代表。为检验社会监督的影响, 用一年中企业名称在财经类报刊媒体和财经类网络媒体报道中出现的次数测量企业受到的社会监督程度, 分别构建指标  $Su1$  和  $Su2$ 。若企业被报刊报道和网络报道的次数高于样本年度中

位数, 则  $Su1$  和  $Su2$  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根据  $Su1_{i,t}$  取值为 1 或 0, 将样本分组后采用 (1) 式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见表 7 第 2 列和第 3 列; 根据  $Su2_{i,t}$  取值为 1 或 0, 将样本分组后采用 (1) 式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见表 7 第 4 列和第 5 列。由第 2 列可知, 在强报刊媒体监督样本组中 ( $Su1_{i,t} = 1$ ),  $Hap_{i,t}$  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由第 3 列可知, 在弱报刊媒体监督样本组 ( $Su1_{i,t} = 0$ ) 中,  $Hap_{i,t}$  的回归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为负。由第 4 列和第 5 列可知,  $Hap_{i,t}$  的回归系数只在弱网络媒体监督样本组 ( $Su2_{i,t} = 0$ ) 中显著为负。以上结果意味着, 对于受社会监督较少的企业, 地区幸福感发挥了更大的税收遵从效应。

#### 5.2 CEO 风险偏好的影响

通过制定企业税收战略的总体方向, 企业 CEO 在税收策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最大化股东财富, CEO 有动机将企业税收支出最小化<sup>[49]</sup>。然而, 激进的避税活动可能使企业受到处罚和谴责, 从而有损 CEO 职业声誉<sup>[77]</sup>。鉴于从事避税活动的风险性, 地区幸福感产生的影响可能因企业 CEO 不同的风险偏好水平而不同, 本研究进一步考察 CEO 风险偏好的影响。在 CEO 的多方面特征要素中, 年龄明显地影响了其对风险的态度。年轻的 CEO 往往更愿意冒险以追求事业成功, 年长的 CEO 则更关心未来的财务安全, 不愿意承担冒险活动相关的风险<sup>[77]</sup>。基于年龄与风险偏好的紧密关联, 本研究采用 CEO 年龄作为 CEO 风险偏好的代表, 用  $Crs$  表示。若 CEO 年龄高于年度样本企业 CEO 年龄的中位数,  $Crs$  取值为 0, 即 CEO 风险偏好较低; 否则  $Crs$  取值为 1, 即 CEO 风险偏好较高。将样本分为两组进行回归, 在 CEO 风险偏好较低 ( $Crs_{i,t} = 0$ ) 时,  $Hap_{i,t}$  和  $HP_{i,t}$  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 在 CEO 风险偏好较高 ( $Crs_{i,t} = 1$ ) 时,  $Hap_{i,t}$  和  $HP_{i,t}$  的回归系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以上结果说明, 地区幸福感对企业税收遵从的积极

表 7 基于社会监督的进一步分析结果  
Table 7 Results of Further Analysis Based on Social Monitoring

变量	$Dtr_{i,t}$			
	$Su1_{i,t} = 1$	$Su1_{i,t} = 0$	$Su2_{i,t} = 1$	$Su2_{i,t} = 0$
$Hap_{i,t}$	-0.001 (-1.011)	-0.002** (-2.398)	-0.001 (-1.149)	-0.001** (-2.26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_{i,t}$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_{i,t}$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140*** (4.095)	0.070 (1.642)	0.131*** (3.849)	0.115*** (2.591)
样本观测值	10 368	10 412	10 508	10 333
调整的 $R^2$	0.210	0.180	0.207	0.178

注: 由于  $Su1_{i,t}$  和  $Su2_{i,t}$  的部分观测值缺失, 整体样本观测值减少。

影响只存在于 CEO 较年轻的企业中,说明地区幸福感的税收遵从效应在管理层风险偏好更高的企业中更显著。

### 5.3 董事会监督的影响

内部控制通过施加监督可以有效抑制管理层从事避税活动<sup>[2]</sup>,而董事会作为企业制度安排的最高监督机构,是内部控制是否发挥作用的决定因素<sup>[78]</sup>,特别是独立董事具有外部独立性,可有效监督企业管理层和大股东的行为,确保内部控制的有效性<sup>[79]</sup>。董事会发挥其监督职能的重要途径是董事会会议,增加董事会会议的频率被证明可以有效抑制企业避税行为<sup>[80]</sup>,在不同的董事会监督强度下,地区幸福感对企业税收遵从的作用也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进一步考察董事会监督水平的影响,参考 BARROS et al.<sup>[80]</sup> 的研究,使用董事会会议的频率和独立董事的出席率代表董事会监督强度。按董事会会议次数和独立董事出席率是否超过年度中位数分别设置虚拟变量  $Bs1$  和  $Bs2$ ,若董事会会议次数和独立董事出席率高于样本年度中位数,  $Bs1$  和  $Bs2$  取值为 1, 否则取值为 0。据此将样本分为强董事会监督组和弱董事会监督组进行分样本回归,董事会监督较强 ( $Bs1_{i,t} = 1, Bs2_{i,t} = 1$ ) 时,  $Hap_{i,t}$  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董事会监督较弱 ( $Bs1_{i,t} = 0, Bs2_{i,t} = 0$ ) 时,  $Hap_{i,t}$  的回归系数均在 5% 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在较弱的董事会监督下,地区幸福感抑制管理层纳税决策的机会主义倾向,进而促进企业税收遵从的作用更加凸显。

### 5.4 经济后果的考察

企业税收遵从水平的提高作为较高地区幸福感的结果,对企业价值存在两方面影响。一方面,由于纳税增加了股东财富向政府的转移,高度的税收遵

从可能有损股东财富从而降低企业价值。另一方面,复杂的避税活动可以为内部人的侵占行为提供掩护,当避税程度较低即税收遵从水平较高时,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存在代理冲突的可能更小,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为考察地区幸福感促进企业税收遵从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本研究参考温忠麟等<sup>[81]</sup>的方法构建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即

$$Dtr_{i,t} = \beta_0 + \beta_1 Hap_{i,t} + \sum \beta_n Con_{i,t} + \sum Yea_{i,t} + \sum Ind_{i,t} + \eta_{i,t} \tag{2}$$

$$TQ_{i,t} = \gamma_0 + \gamma_1 Dtr_{i,t} + \sum \gamma_n Con_{i,t} + \sum Yea_{i,t} + \sum Ind_{i,t} + \xi_{i,t} \tag{3}$$

$$TQ_{i,t} = \delta_0 + \delta_1 Hap_{i,t} + \sum \delta_n Con_{i,t} + \sum Yea_{i,t} + \sum Ind_{i,t} + \sigma_{i,t} \tag{4}$$

$$TQ_{i,t} = \theta_0 + \theta_1 Hap_{i,t} + \theta_2 Dtr_{i,t} + \sum \theta_n Con_{i,t} + \sum Yea_{i,t} + \sum Ind_{i,t} + \varphi_{i,t} \tag{5}$$

其中,  $TQ$  为企业价值;  $Con$  为控制变量;  $\beta_0$ 、 $\gamma_0$ 、 $\delta_0$  和  $\theta_0$  为常数项;  $\beta_1 \sim \beta_n$ 、 $\gamma_1 \sim \gamma_n$ 、 $\delta_1 \sim \delta_n$ 、 $\theta_1 \sim \theta_n$  为回归系数, (2) 式 ~ (4) 式中  $n = 2, \dots, 17$ , (5) 式中  $n = 3, \dots, 18$ ;  $\eta_{i,t}$ 、 $\xi_{i,t}$ 、 $\sigma_{i,t}$  和  $\varphi_{i,t}$  为误差项。(3) 式 ~ (5) 式中,借鉴刘行等<sup>[7]</sup>的做法,采用 Tobin's  $Q$  测量企业价值,等于股票总市值与期末负债账面价值的和除以期末总资产账面价值。 $\delta_1$  代表地区幸福感对企业价值的总效应,  $\theta_1$  代表地区幸福感对企业价值的直接效应。若  $\beta_1$  和  $\theta_2$  都显著,则间接效应显著。模型回归结果见表 8, 第 2 列 ~ 第 5 列依次为 (2) 式 ~ (5) 式的回归结果。由第 3 列可知,当被解释变量为  $TQ_{i,t}$  时,  $Dtr_{i,t}$  的回归系数显

表 8 经济后果的考察: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8 Exploration on Economic Consequences: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s Test

变量	$Dtr_{i,t}$	$TQ_{i,t}$	$TQ_{i,t}$	$TQ_{i,t}$
$Hap_{i,t}$	-0.001*** (-2.627)		-0.003 (-0.809)	-0.003 (-0.858)
$Dtr_{i,t}$		-0.138*** (-2.724)		-0.139*** (-2.74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_{i,t}$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_{i,t}$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179*** (7.876)	11.351*** (68.319)	11.314*** (67.920)	11.339*** (67.979)
样本观测值	20 954	20 954	20 954	20 954
调整的 $R^2$	0.191	0.449	0.448	0.449
Sobel 检验		0.021** (z = 2.308)		
Goodman-1 检验		0.023** (z = 2.271)		
Goodman-2 检验		0.019** (z = 2.346)		

著为负,意味着企业税收遵从对企业价值发挥了正向作用。由第5列可知, $Hap_{i,t}$ 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Dtr_{i,t}$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地区幸福感与企业价值不是直接产生联系,而是通过企业税收遵从间接发生作用。本研究使用Sobel检验方法检验地区幸福感-企业税收遵从-企业价值作用机理的存在,Sobel、Goodman-1、Goodman-2三种间接效应显著性检验结果均显著,表明地区幸福感通过促进企业税收遵从提高了企业价值。

### 5.5 基于社交媒体情感分析测量地区幸福感

社交媒体与大数据分析方法的结合为测量幸福感提供了新的方法<sup>[82]</sup>。已有学者通过判断推特推文<sup>[83]</sup>和微博博文<sup>[82]</sup>传达的情绪状态分析幸福感的地理差异。本研究参考ZHENG et al.<sup>[82]</sup>的研究,通过新浪微博语料分析重新测量地区幸福感。具体做法是:使用腾讯自然语言处理(NLP)平台,对使用Python编程语言收集到的164.560万条带地理标签的公开发表的微博进行情感测量,情绪值的范围从0到1,0表示强烈的负面情绪,1表示强烈的正面情绪。通过计算城市全年微博情绪值的平均值和中位数构建该城市当年的幸福感指数,分别用 $Ha1$ 和 $Ha2$ 表示,这两个值越大,表示地区幸福感水平越高。表9给出回归结果, $Ha1_{i,t}$ 和 $Ha2_{i,t}$ 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基于社交媒体情感分析构建的地区幸福感变量与企业税收遵从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印证了地区幸福感的税收遵从效应。

**表9 基于社交媒体情感分析的地区幸福感与企业税收遵从的回归结果**  
Table 9 Regression Results for Regional Happiness Based on Social Media Sentiment Analysis and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

变量	$Dtr_{i,t}$	$Dtr_{i,t}$
$Ha1_{i,t}$	-0.123*** (-2.974)	
$Ha2_{i,t}$		-0.095*** (-2.85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Yea_{i,t}$	控制	控制
$Ind_{i,t}$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116*** (3.091)	0.100*** (2.888)
样本观测值	15 953	15 953
调整的 $R^2$	0.185	0.185

注:基于2010年~2018年的微博数据构建 $Ha1_{i,t}$ 和 $Ha2_{i,t}$ ,由于2010年之前微博数较少,样本观测值有所减少。

## 6 结论

已有研究多从经济威慑和企业内部治理的角度

考虑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因素,忽视了社会心理因素的作用,本研究从社会心理视角探讨地区幸福感对企业税收遵从发挥的影响。以2007年至2018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展开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所在城市的幸福感对企业税收遵从产生积极影响,企业所在城市的幸福感越高,企业税收遵从水平越高,即地区幸福感对当地企业发挥了税收遵从效应。机制检验表明,地区幸福感能够抑制融资约束对税收遵从的消极影响,强化内部控制对避税行为的约束作用,进而提高企业的税收遵从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地区幸福感的税收遵从效应在受社会监督程度低、CEO风险偏好高和董事会监督薄弱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基于新浪微博社交媒体数据重新测量地区幸福感后,地区幸福感对企业税收遵从依然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最后,本研究还发现,地区幸福感通过促进企业税收遵从提升了企业价值。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①已有研究着重考察企业避税的经济动机,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心理因素如何影响企业纳税决策这一重要问题。本研究将地区幸福感引入到企业税收遵从从决定因素的分析中,拓展了企业纳税决策的社会心理决定因素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②已有研究侧重考察单一的治理特征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且很少讨论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互动效应。本研究从内外部治理机制和企业财务特征的角度,考察正式治理机制与地区幸福感对企业税收遵从的交互作用,为企业税收遵从的非经济动机与经济动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③本研究发现,地区幸福感水平越高,企业纳税越积极,这支持了修宗峰等<sup>[28]</sup>关于地区幸福感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观点,本研究的发现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地区幸福感在促进企业负责任行为中的作用。④本研究拓展了地区特征和企业财务行为领域的研究视角,从地区幸福感切入考察社会心理因素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为研究地区特征的微观经济效应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研究的发现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征收所得税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以提供公共社会服务的必要途径,企业税收遵从问题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经济影响。本研究结果表明幸福感能提高企业的税收遵从水平,印证了非强制性机制在鼓励税收遵从方面的重要作用。企业与社会相互依存决定了企业并非只是只关心自身利益的实体,从传统的经济威慑方法转向社会心理方法来促进企业税收遵从,将有助于节省税收执法成本。此外,地区幸福感不仅能弥补内外部约束机制的不足,还可以与正式风险管理机制发挥协同作用,有效提高企业税收遵从水平,因此,将决定税收遵从的经济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综合考虑并加以运用是促进企业承担纳税义务的有效途径。

本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①用地市级的数据测量幸福感,虽然减少了问卷调查的自我报告偏差,但也存在遗漏变量问题,尽管使用了工具变量,但依然不

能完全解决内生性问题。②未考虑企业所在地搬迁的影响,搬迁导致企业所在地的幸福感水平发生变化,所在地变化导致的企业税收遵从水平差异可能提供关于地区幸福感作用机理的深层信息,未来研究可利用外部冲击导致的企业搬迁事件进一步确定因果关系。③未考虑地区幸福感与一般社会价值观之间的潜在相互作用,如社会距离和集体主义的影响。未来研究可将与幸福感相适应或冲突的社会价值观纳入分析框架。

#### 参考文献:

- [1] 翁武耀. 避税概念的法律分析. *中外法学*, 2015, 27(3): 785-808.  
WENG Wuyao. The directors' heterogeneous impact to the rules of traditional directors' legal analysis on concept of tax avoidance. *Peking University Law Journal*, 2015, 27(3): 785-808.
- [2] 陈作华, 方红星. 融资约束、内部控制与企业避税. *管理科学*, 2018, 31(3): 125-139.  
CHEN Zuohua, FANG Hongxing. Financial constraints, internal control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18, 31(3): 125-139.
- [3] RICHARDSON G, WANG B, ZHANG X M.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evidence from publicly listed private firms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 Economics*, 2016, 12(2): 141-158.
- [4] 许艳. 独立董事、税收激进与融资约束.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1, 36(1): 90-100.  
XU Yan. Research on independent directors, tax aggressiveness and financing constraints. *Journal of Audit & Economics*, 2021, 36(1): 90-100.
- [5] 范子英, 田彬彬. 税收竞争、税收执法与企业避税. *经济研究*, 2013, 48(9): 99-111.  
FAN Ziyang, TIAN Binbin. Tax competition, tax enforcement and tax avoidance.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3, 48(9): 99-111.
- [6] 陈德球, 陈运森, 董志勇. 政策不确定性、税收征管强度与企业税收规避. *管理世界*, 2016, 32(5): 151-163.  
CHEN Deqiu, CHEN Yunsen, DONG Zhiyong. Policy uncertainty, tax enforcement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6, 32(5): 151-163.
- [7] 刘行, 叶康涛. 金融发展、产权与企业税负. *管理世界*, 2014, 30(3): 41-52.  
LIU Hang, YE Kangtao.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e property right and the tax burden on firms.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4, 30(3): 41-52.
- [8] 赵向阳, 李海, 孙川. 中国区域文化地图: “大一统”抑或“多元化”? *管理世界*, 2015, 31(2): 101-119.  
ZHAO Xiangyang, LI Hai, SUN Chuan. The regional cultural map in China: is it “the great unification” or “the diversific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15, 31(2): 101-119.
- [9] 倪鹏飞, 李清彬, 李超. 中国城市幸福感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 *财贸经济*, 2012, 33(5): 9-17.  
NI Pengfei, LI Qingbin, LI Chao.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urban happines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China. *Finance & Trade Economics*, 2012, 33(5): 9-17.
- [10] LUTHANS F, AVOLIO B J, AVEY J B, et al.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relationship with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Personnel Psychology*, 2007, 60(3): 541-572.
- [11] 李树, 于文超. 幸福的社会网络效应: 基于中国居民消费的经验研究. *经济研究*, 2020, 55(6): 172-188.  
LI Shu, YU Wenchao. The social network effect of happiness: an empirical study of Chinese residents' consumption.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20, 55(6): 172-188.
- [12] 钱晓烨, 杨百寅, 迟巍. 心理资本与区域创新活动: 来自我国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中国软科学*, 2014(2): 179-192.  
QIAN Xiaoye, YANG Baiyin, CHI Wei.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city-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 *China Soft Science*, 2014(2): 179-192.
- [13] YOUSSEF-MORGAN C M, LUTHANS F.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well-being. *Stress & Health*, 2015, 31(3): 180-188.
- [14] SUTTER R C, STOUGH R R. Regional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its impact on reg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urban areas of the US//KOURTIT K, NIJKAMP P, STOUGH R R. *Drivers of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ynamics*.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Verlag, 2011: 245-269.
- [15] RYAN R M, DECI E L. On happiness and human potentials: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hedonic and eudaimonic well-being.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1, 52: 141-166.
- [16] USAI A, ORLANDO B, MAZZOLENI A. Happiness as a driver of entrepreneurial initiative and innovation capital.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2020, 21(6): 1229-1255.
- [17] IFCHER J, ZARGHAMEE H. Happiness and time preference: the effect of positive affect in a random-assignment experi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1, 101(7): 3109-3129.
- [18] HUPPERT F A.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evidence regarding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Applied Psychology: Health and Well-Being*, 2009, 1(2): 137-164.
- [19] NELSON D W. Feeling good and open-minded: the impact of positive affect on cross cultural empathic responding.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2009, 4(1): 53-63.
- [20] BARON R A. Interviewer's moods and reactions to job applicants: the influence of affective states on applied social judgment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987, 17(10): 911-926.
- [21] BRETHERL-HAURWITZ K M, MARSH A A.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predict extraordinary altruism.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4, 25(3): 762-771.
- [22] DIENER E, RYAN K. Subjective well-being: a general overview.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9, 39(4): 391-406.
- [23] AKNIN L B, DUNN E W, NORTON M I. Happiness runs in a circular motion: evidence for a positive feedback loop between prosocial spending and happines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2, 13(2): 347-355.
- [24] JIN S S. *Reverse the question: does happiness raise economic output? Evidence from the European value survey, 1981-2009*. Stockholm: KTH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13: 22-24.
- [25] AKNIN L B, BARRINGTON-LEIGH C P, DUNN E W, et al. Prosocial spending and well-being: cross-cultural evidence for a psychological universa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3, 104(4): 635-652.
- [26] HILARY G, HUI K W. Does religion matter in corporate decision making in America?.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9, 93(3): 455-473.

- [27] 修宗峰, 杜兴强. 幸福感、社会资本与代理成本. *中国工业经济*, 2011(7): 107-117.  
XIU Zongfeng, DU Xingqiang. Happiness, social capital and agency costs.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1(7): 107-117.
- [28] 修宗峰, 周泽将. 地区幸福感、社会资本与企业公益性捐赠. *管理科学*, 2016, 29(2): 146-160.  
XIU Zongfeng, ZHOU Zejiang. Regional happiness, social capital and corporate philanthropic giving.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16, 29(2): 146-160.
- [29] DOWLING G R. The curious case of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is it socially irresponsible?.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4, 124(1): 173-184.
- [30] SIKKA P. Smoke and mirror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ax avoidance. *Accounting Forum*, 2010, 34(3/4): 153-168.
- [31] DEVOS K. *Factors influencing individual taxpayer compliance behaviour*. Dordrecht: Springer, 2014: 14.
- [32] ALLINGHAM M G, SANDMO A. Income tax evasi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72, 1(3/4): 323-338.
- [33] 王玺, 刘萌. “互联网+”背景下税收遵从的提高: 挑战与对策. *税务研究*, 2020(7): 58-63.  
WANG Xi, LIU Meng. On the improvement of tax compliance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plus”: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Taxation Research*, 2020(7): 58-63.
- [34] ALM J, MCCLELLAND G H, SCHULZE W D. Why do people pay tax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2, 48(1): 21-38.
- [35] HANLON M, HEITZMAN S. A review of tax research.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0, 50(2/3): 127-178.
- [36] D'ATTOMA J W, VOLINTIRU C, MALÉZIEUX A. Gender,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and tax compliance. *CESifo Economic Studies*, 2020, 66(3): 265-284.
- [37] JAYAWARDANE D. Psychological factors affect tax compliance: a review pap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s and Commerce*, 2015, 4(6): 131-141.
- [38] SLEMRD J. Tax compliance and enforce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9, 57(4): 904-954.
- [39] KIRCHLER E. *The economic psychology of tax behaviou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67-68.
- [40] 王永培, 晏维龙. 产业集聚的避税效应: 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中国工业经济*, 2014(12): 57-69.  
WANG Yongpei, YAN Weilong. The tax avoidance effec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4(12): 57-69.
- [41] 张明, 蓝海林, 陈伟宏, 等. 本土宗教传统与公司避税: 基于我国34 100座寺院和8 349座宫观的实证研究. *经济学(季刊)*, 2021, 21(4): 1345-1368.  
ZHANG Ming, LAN Hailin, CHEN Weihong, et al. Indigenous religious tradition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34 100 monasteries and 8 349 temples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21, 21(4): 1345-1368.
- [42] NURWANAH A, SUTRISNO T, ROSIDI R, et al. Determinants of tax complianc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nd stakeholder theory perspective.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in Management*, 2018, 16(4): 395-407.
- [43] 张茵, 刘明辉, 彭红星. 社会信任与公司避税. *会计研究*, 2017(9): 48-54.  
ZHANG Yin, LIU Minghui, PENG Hongxing. Social trust and tax avoidance. *Accounting Research*, 2017(9): 48-54.
- [44] HASAN I, HOI C K S, WU Q, et al. Does social capital matter in corporate decisions? Evidence from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17, 55(3): 629-668.
- [45] LANE T. How does happiness relate to economic behaviour?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 2017, 68: 62-78.
- [46] DROUVELIS M, GROSSKOPF B. The effects of induced emotions on pro-social behaviour.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6, 134: 1-8.
- [47] FERRER-I-CARBONELL A, GËRXHANI K. Tax evasion and well-being: a study of the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6, 45: 149-159.
- [48] JUDGE T A, KAMMEYER-MUELLER J D. Happiness as a societal value.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1, 25(1): 30-41.
- [49] REGO S O, WILSON R. Equity risk incentives and corporate tax aggressivenes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12, 50(3): 775-810.
- [50] WILSON R J. An examination of corporate tax shelter participants.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9, 84(3): 969-999.
- [51] KIM J B, LI Y H, ZHANG L 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 firm-level analysi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1, 100(3): 639-662.
- [52] 袁蓉丽, 李瑞敬, 夏圣洁. 战略差异度与企业避税. *会计研究*, 2019(4): 74-80.  
YUAN Rongli, LI Ruijing, XIA Shengjie. Corporate strategy deviance and tax avoidance. *Accounting Research*, 2019(4): 74-80.
- [53] FOO M D. Emotions and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evaluation.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1, 35(2): 375-393.
- [54] MANO H. Risk-taking, framing effects, and affect.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4, 57(1): 38-58.
- [55] OTTO A R, FLEMING S M, GLIMCHER P W. Unexpected but incidental positive outcomes predict real-world gambl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6, 27(3): 299-311.
- [56] 吴联生. 国有股权、税收优惠与公司税负. *经济研究*, 2009, 44(10): 109-120.  
WU Liansheng. State ownership, preferential tax, and corporate tax burdens.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9, 44(10): 109-120.
- [57] 张座铭, 田彬彬. 税务中介组织对企业税收遵从的影响考察. *税务研究*, 2020(11): 119-124.  
ZHANG Zuoming, TIAN Binbin. An analysis on the impacts of tax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on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 *Taxation Research*, 2020(11): 119-124.
- [58] 刘斌, 李磊, 莫骄. 幸福感是否会传染. *世界经济*, 2012, 35(6): 132-160.  
LIU Bin, LI Lei, MO Jiao. Is happiness infectious?.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2012, 35(6): 132-160.
- [59] ZIMMERMAN J L. Taxes and firm size.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83, 5: 119-149.
- [60] REGO S O. Tax-avoidance activities of U. 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03, 20(4): 805-833.
- [61] 樊勇, 王蔚. 市场化程度与企业债务税盾效应: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财贸经济*, 2014, 35(2): 44-55.  
FAN Yong, WANG Wei. Marketization level and tax shield effect

- of enterprise deb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Finance & Trade Economics*, 2014, 35(2): 44–55.
- [62] PRATAMA I, SURYARINI T. The role of independent commissioners in moderating the effect of capital intensity, inventory intensity, and profitability on tax aggressiveness. *Accounting Analysis Journal*, 2020, 9(3): 208–214.
- [63] 刘行, 赵晓阳. 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是否会加剧企业避税?. *经济研究*, 2019, 54(10): 121–135.  
LIU Hang, ZHAO Xiaoyang. Does increasing the minimum wage induce tax avoidance?.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9, 54(10): 121–135.
- [64] GRAHAM J R, HANLON M, SHEVLIN T. Barriers to mobility: the lockout effect of U. S. taxation of worldwide corporate profits. *National Tax Journal*, 2010, 63(4): 1111–1144.
- [65] 赵天骄, 李成. 营商环境对企业税收不确定性的影响研究: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 *财政研究*, 2021(9): 85–101.  
ZHAO Tianjiao, LI Cheng.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corporate tax uncertain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rporate life cycle. *Public Finance Research*, 2021(9): 85–101.
- [66] GUPTA S, NEWBERRY K. Determinants of the variability in corporate effective tax rates: evidence from longitudinal data.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1997, 16(1): 1–34.
- [67] CHEN S P, CHEN X, CHENG Q, et al. Are family firms more tax aggressive than non-family firm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0, 95(1): 41–61.
- [68] 毛捷, 吉黎, 赵忠秀. 亏损抵扣、风险分担与企业投资: “沉睡合伙人”假说的经验证据. *金融研究*, 2016(10): 174–189.  
MAO Jie, JI Li, ZHAO Zhongxiu. Loss deduction, risk sharing and firm investment: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sleeping partner hypothesis.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2016(10): 174–189.
- [69] 代彬, 彭程, 刘星. 高管控制权、审计监督与激进避税行为. *经济管理*, 2016, 38(3): 67–79.  
DAI Bin, PENG Cheng, LIU Xing. Executive control power, audit supervision and corporate tax aggressivenes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Journal*, 2016, 38(3): 67–79.
- [70] BRERETON F, CLINCH J P, FERREIRA S. Happiness, geography and the environment.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8, 65(2): 386–396.
- [71] ALLEN M A, FISCHER G J. Ambient temperature effects on paired associate learning. *Ergonomics*, 1978, 21(2): 95–101.
- [72] 高红莉, 张东, 许传新. 住房与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实证研究. *调研世界*, 2014(11): 18–24.  
GAO Hongli, ZHANG Dong, XU Chuanxin. Empirical research on housing and urban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World of Survey and Research*, 2014(11): 18–24.
- [73] 张翔, 李伦一, 柴程森, 等. 住房增加幸福: 是投资属性还是居住属性?. *金融研究*, 2015(10): 17–31.  
ZHANG Xiang, LI Lunyi, CHAI Chengsen, et al. Housing increases happiness: investment attribute or residential attribute?.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2015(10): 17–31.
- [74] STOCK J H, YOGO M. Testing for weak instruments in linear IV regression//ANDREWS D W K, STOCK J H. *Identification and Inference for Econometric Models: Essays in Honor of Thomas Rothenber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80–108.
- [75] KAPLAN S N, ZINGALES L. Do investment-cash flow sensitivities provide useful measures of financing constraint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 112(1): 169–215.
- [76] 田高良, 司毅, 韩洁, 等. 媒体关注与税收激进: 基于公司治理视角的考察. *管理科学*, 2016, 29(2): 104–121.  
TIAN Gaoliang, SI Yi, HAN Jie, et al. Media coverage and tax aggressiveness: a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16, 29(2): 104–121.
- [77] JAMES H L. CEO age and tax planning. *Review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20, 38(2): 275–299.
- [78] HOITASH U, HOITASH R, BEDARD J C.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 a comparison of regulatory regimes.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9, 84(3): 839–867.
- [79] 郑春美, 伍光磊, 温桂荣. ESG框架下财会背景独立董事履职能否改善会计信息质量? 基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视角.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21, 42(6): 89–95.  
ZHENG Chunmei, WU Guanglei, WEN Guirong. Independent directors of financial & accounting and the qual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under the ESG framework: based on internal control effectivenes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21, 42(6): 89–95.
- [80] BARROS V, SARMENTO J M. Board meeting attendance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evidence from the UK. *Business Perspectives and Research*, 2020, 8(1): 51–66.
- [81] 温忠麟, 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5): 731–745.  
WEN Zhonglin, YE Baojuan. Analyses of mediating e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methods and model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4, 22(5): 731–745.
- [82] ZHENG S Q, WANG J H, SUN C, et al. Air pollution lowers Chinese urbanites' expressed happiness on social media. *Nature Human Behaviour*, 2019, 3(3): 237–243.
- [83] CURINI L, LACUS S, CANOVA L. Measuring idiosyncratic happines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witter: an application to the Italian cas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5, 121(2): 525–542.

## Effect of Regional Happiness on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

SHEN Weitao, LI Dukangqi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As a modification of the rational hypothesis,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model of decisions regarding tax payment asserts that the taxpayer's decision-making about tax payment is not only subject to the utility maximization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it is also influenced by psychological factors. As a regional psychological factor that has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in existing research, regional happiness can affect the tax compliance of local corporations.

Happiness is a dimension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Regional happiness belongs to the group psychological capital shared by social members; therefore, it can have an impact on corporates' tax decision-making. There are two side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happiness and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 On the one hand, the prosocial tendency accompanied by regional happiness will increase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 which should manifest as higher corporate tax payment. On the other hand, regional happiness may also increase corporates' tolerance to the potential risks of tax avoidance so that corporates are more likely to engage in tax avoidance, and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 will be reduced. A set of competing hypotheses is proposed for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Data of Chines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during the period 2007-2018 are used as the sample source. In addition, the following methods are applied to examine whether regional happiness can promote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correlation test,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robustness test methods includ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and substitute variable method. This study also explores the mechanism, heterogeneity factors,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regional happiness' influence on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appiness of the city where the company is located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 the higher the happiness, the higher the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unchanged after addressing potential endogenous problems. The results of the mechanism test show that regional happiness can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financial constraints on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 and promote the restraint function of internal control on tax avoidance, thus increasing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 Moreover, we observe that the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 effect" of regional happiness is more pronounced in companies with low levels of social supervision, high levels of management risk appetite, and weak board supervision. Additionally, we conduct a sentiment analysis of data from Sina Weibo to re-measure regional happiness, and find that happiness still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 Finally, we find that regional happiness can promote corporate value by increasing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happines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 developing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for studying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tax payment decisions. It also provid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maximizing the value of happiness. The "tax compliance effect" of regional happiness suggests that China's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focusing on people's happiness is not only of social significance but also has important economic implications.

**Keywords:** happiness; social psychology; corporate tax compliance; psychological capital; financing constraints; internal control

---

**Received Date:** March 11<sup>th</sup>, 2020      **Accepted Date:** April 12<sup>th</sup>, 2022

**Biography:** SHEN Weitao, doctor in economics, is a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Management at Xiamen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apital markets and corporate finance. His representative paper titled "Venture capital will affect the market making transfer behavior of firms?—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f the NEEQ in China" was published in the *Economic Management Journal* ( Issue 10, 2016). E-mail: [wtshe@xmu.edu.cn](mailto:wtshe@xmu.edu.cn)

LI Dukangqi is a Ph.D candidate in the School of Management at Xiamen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orporate fin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E-mail: [lidukangqi@126.com](mailto:lidukangqi@126.com) □

(责任编辑: 李祎博)